

李伟长:生活可以中断,但不可能被摧毁



李伟长 受访者供图

一座图书馆在战争中被炸成废墟。残垣断壁间有三位衣冠整齐的绅士,神态坦然地站在没被破坏的书橱前挑选书籍。这是李伟长最新一部阅读随笔集的封面,也是他心中“未被摧毁的生活”。

生活千疮百孔,幸好有文学一息尚存。在李伟长这里,阅读不只是安放身心的避难所,也是认知自我的摆渡船:“如果说我的内心是一片海洋,当船‘啪’一下撞上的时候,我才真正看到海里的岛屿和暗礁。”

在《未被摧毁的生活》中,李伟长回溯《剥洋葱》,撞到了当初那个“自恃颇有才华,因为虚荣和稿费诱惑开始写书评”的青年;沿着《在路上》,他找到了“我们村的凯鲁亚克”,自己的族叔;年过不惑,李伟长在《柳林风声》的獾先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倒影,学着接受一些“无能为力”。在阅读纪行中,李伟长用自己的方式面对这么多年的变化。

在张定浩眼里,书评文章就像一个个沿途制造的“水洼”,它们能够溅起一时的水花,反映一时的云影,但随着时间的延续,这些“水洼”很多都会慢慢消失,这也是书评写作者的某种宿命,但老友李伟长这次的文章有点不一样:“李伟长回过头来寻找那些曾经的‘水洼’,为那些‘水洼’一点点凿出新的通道,让十几年前的‘水洼’变成一条还能够流淌的河流,通向现在的自我,从而也推动着过去的自我和现在的自我一起,慢慢走向未来。”

现代快报+记者 姜斯佳

有“我”的阅读随笔

读品:让我们从《未被摧毁的生活》谈起。据说书名来自为您作序的张新颖老师的一首诗《清单》。您能具体谈谈“未被摧毁的生活”书名背后的内涵吗?

李伟长:非常偶然,有一次我跟张新颖老师聊到我的新书,他提议书名用“未被摧毁的生活”,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个书名的好。等到这本书编成以后,我就像灵光乍现一样想到了这个题目,跟编辑沟通的时候他们也觉得特别好。“未被摧毁的生活”这个词又有力量,又有很沉郁的部分,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属于个体的悲壮。这种力量不是鸡汤式的,也不是口号式的,而是因为你经历过摧毁,但你依然生存了下来,当你走出来再回首过去的时候,你可以说那是“未被摧毁的生活”。它如此简单,但是对那些热爱生活、有激情去感受生活的人,他们知道这句话其实意味着很多。生活会被中断,但不可能被摧毁。

第二个故事是,我跟张定浩是多年的朋友,经常会在一起聊天,当时聊到这个书名,张定浩说你还记得有一张照片,一幢被炸毁的图书馆,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伦敦的荷兰屋。就是天作之合,一个好的书名,还有一个朋友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你提供了一张照片。

读品:您将自己出的几本书都概括为“阅读随笔集”,比起一般的书评,阅读随笔似乎更从容、更自由、也更“不正经”一些。书中有一篇《我见犹怜》,评论的是《害羞的屁股——有关臀部的历史》这本书,卸下了人们对书评严肃、庄重的刻板印象,这是有意为之吗?

李伟长:原来写书评有一种职业性的认定:书评里可以有“我”的存在,但是“我”不能大过这本书。书评人的任务是找到这本书的价值,尽量清晰地传递给读者。我后来写评论,写着写着自己会不满足,不满足的地方在于“我”慢慢消失。最近出的几本书都叫“阅读随笔”,因为严格意义上讲,它没有书评的那种目的性,也没有评论的那种规范性。我的阅读随笔没那么高深,充满怪趣味,有的时候浅尝辄止,但它一定是有“我”在里头的。这个东西它既

郁的部分,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属于个体的悲壮。
『未被摧毁的生活』这个词又有力量,又有很沉



译林出版社 李伟长 著

《未被摧毁的生活》
李伟长著
译林出版社

李伟长

生于江西,现居上海,写评论和阅读随笔,出版有《珀金斯的帽子》《人世间多是辜负》《未被摧毁的生活》等阅读随笔集。

读书人,写作者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

真诚又很危险,当你一旦涉及到自己的时候,你看上去会比较亲切,但实际上在讨论一些更普遍意义上的问题时,公平性和公正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打了折的。

戴着珀金斯的帽子剥洋葱

读品:《格拉斯的洋葱》让我印象深刻。您用近乎严厉的目光审视了自己写下的第一篇书评——评君特·格拉斯的《剥洋葱》,在重新分析“剥洋葱”这一主题的同时,也是将旧日的自我当做“洋葱”,展开层层剖白。能否为我们完整地梳理一下您的职业发展历程?作为文学批评从业者,这些年在哪方面得到了拾遗补缺,哪方面还不太满意?

李伟长:这十几年,我慢慢意识到自己的缺陷和弱点,而且非常清晰。不满意的地方在哪?其实用一两句话就可以表达:我还没有建构起属于自己相对完整的或者相对系统的审美。你说我有没有能力去判断一个东西的好坏?我觉得我是有的,甚至某种程度上我可能比较开放一点,因为我见过各种各样的门类。但是客观地讲,我经常会考虑,当我看到一本书的时候,它到底好在哪?它有多好?它放在整个系统里面,或者放到整个文学史的脉络里,它大概属于什么样的位置?我很羡慕有些人会很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,但是我还不行,我自己有的时候还会很犹豫,找不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流畅、清晰话语来表达,这个其实是我经常焦虑的部分。

读品:在阅读和写作道路上,哪些作家和作品对您产生了比较深的影响?

李伟长:这些年我反复读一本书,就是克尔凯郭尔的《恐惧与战栗》。这是克尔凯郭尔的一本哲学著作,里面着重谈的是“悲剧英雄”和“信仰骑士”。所谓的悲剧英雄,就是当悲剧来临的时候,他知道会发生什么,而且也知道他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住,所以他才会做这种选择。当神的使者要求阿伽门农献祭女儿的时候,他知道只要献祭了女儿,军队就可以出港,成就霸业。什么样的人是“信仰骑士”?他身上存在一种绝对性,一旦他在信仰中投入自我以后,他会全身心地投入,而且不会祈求、不会幻想别人理解。《圣经》里的亚伯拉罕献祭爱子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,但他接受所有的安排和可能。我每天都在做很多事务性的事情,有时候可能会委屈。但是克尔凯郭尔的这套论述立马就会警醒我:你做这些到底是为什么?它不但影响我的阅读、我的文学判断,甚至影响了我看待生活。

还有一本小说《小人物日记》(The Diary of a Nobody)。它给我带来了欢乐,而且不知不觉给了我一种滋养:哪怕你知道你的生活可能没有多大价值,但是依然要郑重其事地生活。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就像书中的普特尔先生一样,一生都是nobody,但普特尔先生他那么认真,而认真一定会带来滑稽感,滑稽感自己是意识不到的。如果我们意识到的时候还能滑稽下去,自得其乐地爱命运,就是我极为赞赏和欣赏的一种态度。

读品:如果说《格拉斯的洋葱》是身为书评人的反省,《珀金斯的帽子》则反映了对当下出版编辑行业的思索,“珀金斯式的编辑正在消失”。作为出版人,您对自己、对整个行业有怎样的期许?

李伟长:像珀金斯这样的编辑,他真的只属于某一个时代,那个时候编辑其实还有“统治力”,你的写作如果无法打动一个编辑

的话,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所谓的出版体系里去的,也没有机会和更广大的读者见面。不像现在有新媒体,有个体平台,有说话的空间。那个时候,编辑就像城堡前面的守卫或者领路人一样。我们怀念珀金斯,其实怀念的是一个伯乐,一个才华的识别体系。每个人都会期盼有属于自己的珀金斯,他有能力来识别你、激发你,最后让你成为海明威那样的传奇。工业化以后,这种事情变得可望不可及。但是我一直相信一定有这种编辑存在。

我最初看到珀金斯的时候非常激动,因为他和我的工作有关系。那个时候我也全身心地想扮演这种角色,去发现那些年轻人。大概2008年的时候,我在上海作协参加了一个计划叫“文学百校行”,就是到学校里去找那些有文学才华的苗子,你现在知道的几个90后作家:三三、吴清源、王苏辛、郑在欢、李唐,都是我们那会儿发现的。

我一直很好奇,当一堆稿子送到珀金斯面前的时候,他是怎么知道这个人有潜力的?我们当时设想过很多,一个好的作者,首先得有感受力、想象力,还得有语言的准确性,当然这个标准有点机械。现在回过头来想,自己所做的其实非常有限。我现在觉得其实相对于被发现这件事,一个作家写得好不好本身更加重要,只要他写得好他一定会被发现的。

“杰出的灵魂是虚构不出来的”

读品:出生入死的桑塔格、特立独行的温特森、波德莱尔的身份、以赛亚·伯林的普通生活……这几篇都是对作家传记的评论,为什么对传记如此感兴趣?

李伟长:我的确对作家传记太有兴趣了。到现在为止我心目中有几部好的传记,一部是写梵高的《渴望生活》,还有叶礼庭的《伯林传》,迷人得不得了,真是会写!我看这些传记是把它们当成虚构作品来看的,我无法考证传记里的人物和真实的历程到底是不是完全重合的,但我不在乎,我看到的是这个人在这本书里的状态,他们如何找到自己。

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有一种偏见,我觉得好的小说家写出的生活,有的时候远远没有真实生活来得更加动人,更加合理,甚至更加复杂,这些杰出的灵魂是虚构不出来的。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,我会对那些杰出的小说家顶礼膜拜,他可以想象出那样的人物,那样的生活,比如说《大师与玛格丽特》《日瓦戈医生》……

读品:在居家期间,您如何安排日常生活,怎样调试自己的心态?

李伟长:这段时间我把E.B.怀特的几本书重新找出来读了一遍,有的时候带着小朋友去读。我读的是英文原文,然后我就意识到一点,为什么E.B.怀特这么好,因为他是一个极其会用词的人,他不会重复用一个词汇,同时让你觉得精准。此外,E.B.怀特是一个特别会描写感觉的人。他特别会准确地捕捉和感受到某一个场景中的情绪状态、感官感受,而且极其优美。

有的会说,你干吗不趁这个时间写点东西记录一下?我说,该写的其实已经在自己心里已经盘算过了,但是对大部分小说家来讲,过于当下的事情对小说家来讲是不适合去记录的,小说家一定要等一段时间过去以后,稍微有一个距离,他才可能去打量,去观察。这个距离不能太远,太远他会看不清楚,但也不能太近,太近他会看不到整体,但合适的距离到底有多长,可能因人而异。

大读家